

以伟大抗疫精神厚植前进力量

■ 朱亮高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每遇重大风险挑战，总能孕育伟大精神。这是一个伟大政党引领伟大人民、伟大民族锻造的伟大基因，进而演绎新的伟大的制胜法宝。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在这场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在“两个大局”交织跌宕的关键时刻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扬斗争精神、抵御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团结奋斗的生动写照，为抗击各类风险挑战矗立了精神丰碑、照亮了壮阔征程。

生命至上，用价值追求抗击各种风险挑战。在打响这场人民战“疫”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生命至上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光辉、人间大爱的最高尊重；充分再现了中华民族关爱生命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立场的矢志不渝。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最好诠释，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全景式、全方位、全过程战“疫”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深刻阐发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我们只有把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毫不动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团结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抵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举国同心，用团结伟力抗击各种风险挑战。面对生死考验，面对长时间隔离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广大人民群众生死较量不畏难、千难万险不退缩，或向险而行，或默默坚守，以各种方式为疫情防控操心出力。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16座方舱医院、600多个集中隔离点；全国，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千千万万志愿者以及快递员、环卫工人……14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我们要充分认清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期碰撞带来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统一意志、团结一致、步调一

致，无论遭遇何种风险挑战，中国人民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战而胜之。

舍生忘死，用顽强意志抗击各种风险挑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而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

75年前，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穿越75年历史时空，伟大抗战精神与伟大抗疫精神，同样既弥足珍贵、感天动地，又一脉相承、交相辉映。面对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暴露的各种风险挑战，和平年代，舍生忘死精神，需要熠熠生辉、别样弘扬。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时代硬汉、人民英雄和民族脊梁。

尊重科学，用实践品格抗击各种风险挑战。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秉持科学精神、守正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有力有效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无论是先后推出的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还是筛选出的“三药三方”等治疗方案；无论是抢建方舱医院，还是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实践表明，准确把握形势变化，因时因势作出疫情阻击、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实事求是的重大决策，都是尊重科学的彰显。同时，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使得

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

命运与共，用道义担当抗击各种风险挑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不孤，大爱无疆。我们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充分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种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种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种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种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

■ 陈宪

【编者按】作为上海市社联第十四届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等单位日前联合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上海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上海如何打造成为枢纽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本报今摘编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行政壁垒何以形成，又如何破解？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区域一体化为破解行政壁垒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条件。观察表明，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行政区划的门槛，即壁垒的存在和高低。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行政区划的壁垒，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行政壁垒正在逐步消解，但仍然以自身的方式对要素自由流动起着阻碍作用。可见，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是造成区域间不同程

度行政壁垒的主要原因。

“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一个可行的途径是编制和实施区域一体化规划。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简称《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因此，太仓、昆山、吴江和嘉善等市市区，都在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

编制和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协调行政隶属和都市圈存在的关系。我们认为，在编制《上海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时，江浙沪区域在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情况下，由该规划统筹协调其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将逐步打破行政壁垒的途径，获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推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有关部门要加强都市圈规划编制的统筹协调，研究制定支持都市圈建设的政策措施。同时，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可通过招投标方式，由第三方机构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并由各地政府组织协调，负责实施。

重点领域专项规划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卡通为着力点，努力提升都市圈同城化水平。《纲要》列举了重点领域规划的主要内容：统一规划建设都市圈内路、水、电、气、邮、信息等基础设施，加强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市域和城际铁路、道路交通、毗邻地

区公交线路对接，构建快速便捷都市通勤圈；实现都市圈内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服务资源一卡通共享，扩大公共服务辐射半径，打造优质生活空间；推动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镇)疏解，在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功能疏解承载地；推动都市圈内新型城市建设，打造功能复合、智慧互联、绿色低碳、开放包容的未来城市。

根据区域一体化的需要，有关机构正在编制和实施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如已经编制和正在实施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根据该方案，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并选择青浦区金泽镇、朱家角镇，吴江区黎里镇、嘉善县西塘镇、姚庄镇作为一体化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面积约660平方公里。在这个区域，以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为主导，同时推进经济发展协同创新和社会事务协同安排，由此也将对打破行政壁垒产生积极的效果。

《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都市圈间合作互动，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在这个城市群中，有上海大都市圈、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已经初具规模或雏形。我们建议，在综合各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掌握必要的时间节奏，陆续组织编制和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可考虑率先编制《上海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可能的难点是规划范围的协调与确定。《上海大都市圈发展规划》的立意和起点要对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规划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突出四个方

面的内容：优化制度设计，驱动创新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强化协调机制。上海大都市圈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在这些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近年来，规划即法的意识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规划不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一纸空文，而是必须自觉维护、严肃执行的法律性文件，这是保证“规划引领”的前提条件。所以，就规划落地而言，现在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条件。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大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力度，普及规划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依法做好规划工作的自觉性。

都市圈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是跨行政区划的规划，其执行与落地有着特殊难度，需要在具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据此，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为主导，完善要素市场，充分明确市场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通过市场供需调整土地价格，满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二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存在行政壁垒的市场竞争，必然以寻求行政区划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为目标，造成区域市场割裂；三是协调各城市在招商引资、市场准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广泛合作。政府、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是协调机制的主体。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中国新发展格局促进全球化均衡发展

■ 郭树勇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中长期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国际背景来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产生了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需求。变局的加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关系多极化进一步发展。中国是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采取各种措施稳增长、保增长，是维护主权、维护国际地位、维护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抗疫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表明，要摆脱危机和困难，一定要走国际治理、国际合作之路，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国际社会认可中国在国际抗疫中的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不支持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制裁措施和“脱钩”企图，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反对霸凌主义，取得反遏制胜利的信心与力量。

其次，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社会的分化性相对增多。冷战结束以来有了“三十年国际体系平稳期”，但也逐渐积累起多种政治力量，各种矛盾不断释放出来，产生了一种叠加效应，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释放形式主要是经济制裁、军事冲突、政治

干预、文明冲突，还有同盟瓦解与重组。这些虽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世界秩序，但是形成了四个国际政治矛盾集中诱发点和国际热点，即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国际力量重组以及联合国改革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

最后，美国政府近年来出于维护霸权利益、战略利益和国内政治利益等考虑，采取了全面和实质性的对华遏制战略，继“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又连续抛出“印太战略”等。2018年后通过持续贸易摩擦，妄图使中美经济关系“脱钩”；与此同时竭力将“脱钩”战略向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2020年以来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战的力度，鼓动欧洲盟国和亚洲盟国对华等为美国科技企业提供压力。面对美国的全面遏制，中国实施“两手”策略：一手是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参与全球治理，争取国际社会最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特别是在稳定周边方面多下功夫、用心经营，不断深化各类伙伴关系，为区域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和新型全球化做出贡献；另一手是主动调整外交重点和内外治理统筹，做好应对各种挑战的准备。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全球化均衡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具体实践。(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余佳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牢牢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正当其时。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潜力巨大。然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表现在创新能力亟需提升，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此背景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活内需大潜力，成为形成“双循环”的源泉和动力。

城乡长期共生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因此，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城乡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动态平衡。通过发展新基建、新技术、新业态，拉长城市发展长板，补上乡村发展短板，扩大投资需求；通过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提高全体国民收入，提升有效购

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内驱动力。

这些年经过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推动乡村振兴，我国农村局面有了较大改观，但在城乡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小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是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以城乡基础设施联通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撑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催生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促成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强大信心。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要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将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优势，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际货币体系大变局下的战略思考

■ 袁志刚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美国仍旧在发货币以对付经济的衰退，美元泛滥成灾，其长期价值走势堪忧，金融投机猖獗，黄金大幅升值。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到来。

高企的国内政府债务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开始蜕变。众所周知，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独霸。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然面临严重挑战。由于深层次结构性缺陷，美元霸权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桎梏，将无法永远存续。任何单极的货币金融体系都已不适合经济日益多极化的当今世界，同时这也意味着未来符合世界潮流的将是一个多极化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是以另一货币霸权来替代当前的美元霸权。

欧元区的人口略大于美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九成，出口规模超过美国，拥有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完善与专业的中央银行制度。欧元

本该是美元的强劲竞争者，然而欧元过去并没有成为美元真正的竞争对手，欧元危机暴露了欧元作为美元竞争者的“阿喀琉斯之踵”：欧盟财政缺乏一体化，无法提供与美国国债类似的全球安全资产——欧元债券。但是，近日欧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复苏欧盟经济发行了7500亿欧元的共同债券，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与美国国债相媲美的全球安全资产——欧元债券已经崭露头角。其次，欧盟复苏计划将一扫欧元危机以来欧盟财政政策乏力的阴霾，欧盟财政一体化走上正轨。

促进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归根结底有两个途径：一是在国际贸易中更多地使用该货币；二是由国际金融市场推进该货币的使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正在成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进国际化的基础。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与开放的加速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中国经济的这两个重大结

构性变化，预示着未来十年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机遇的到来。

当今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程度之深，难以轻易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任何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危机都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更加助长民族主义政治，逆全球化的势力将更加难以阻挡，而这样的变化都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稳定，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变革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而非激进的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健全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加速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形成庞大的统一内需市场，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宏观经济将出现两大深刻变化：一是全球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更趋尖锐，投资有效性有效消解；二是发达经济体陷入低利率陷阱，庞大的货币刺激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投资者在全球到处追逐能够提供合理收益的金

融资产。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与东亚国家最大的外需来源，疫情之后，我国应该通过更有力的城市化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并持续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扩大内需，使得中国需求成为东南亚及东亚地区的“定海神针”。利用内需市场的巨大杠杆，以东南亚及东亚的国际贸易为起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一是防范巨大的国际短期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防范国内企业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借助债券市场的开放与发展再度显著加杠杆的风险，致使宏观杠杆率再度攀升；三是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合理把握商业银行部门的规模收缩节奏以及金融转型所需要的各类改革和监管措施的推进。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